

建军史新论

JIAN JUN SHI XIN LUN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建 军 史 新 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军史新论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 北京 : 中共党史出版社 , 2018.8

ISBN 978-7-5098-4666-7

I . ①建… II . ①中… III .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IV . ① E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9229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亚平

复 审：潘鹏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k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字 数：178 千字

印 张：14.5

印 数：1—2550 册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4666-7

定 价：3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目 录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回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欧阳淞	1
在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游击队革命斗争史学术	
研讨会上的讲话 龙新民	9
湘南起义永垂青史 龙新民	16
在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9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吴德刚	20
祝贺 · 视角 · 贡献 · 启迪	
——在“毛泽东与秋收起义”学术研讨会上的	
讲话 李忠杰	24
湘南起义与中国革命 王相坤 光新伟	32
从以农民为主力的广东暴动到广州起义	
——从广州起义的发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中国	
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徐玉凤	42
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党对党军关系的认识与实践 曹子洋	61
叶剑英与人民军队的创建 徐玉凤	81
论湘南暴动的计划与发动 徐嘉	94

试论红军长征中组织的川滇黔红军游击队	李蓉	110
共产国际、苏联关于中国西北地区革命发展的计划 及对中共的影响	王树林	126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特点	光新伟	153
红军改编与人民军队政治制度的变迁 ——以军政委员会制度为中心的考察	王树林	169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游击战军事方针的确立	杨凯	185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探析	吴伟锋	212
后记		227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回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欧阳淞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仅深刻阐明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本质特征，而且明确指出了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得以确立的三个重要历史节点，对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更自觉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

“大幕”开启之前，1927年7月中旬，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当局，在实行反革命“分共”政策的同时，命令其下属的第一、第二方面军等部“东征讨蒋”。身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一方面不愿“东征讨蒋”，企图率部队南下广东；另一方面，又在暂不“分共”和准备“清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聂荣臻奉周恩来之命，前往九江传达中央的这一重要指示。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分析当时形势，研究中央指示的落实。会议提出，党在第二方面军中所掌握的部队，应尽快脱离张发奎，与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一道，在南昌举行起义。7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南昌起义的计划，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在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的军队在南昌起义，激烈的战斗持续了4个多小时，最终消灭敌人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起义军占领了整个南昌城。8月1日，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决定成立以刘伯承为参谋长的参谋团，负责领导军事斗争，并立即调整了起义军的编制。在整编中，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在团这一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在营这一级建立了党的小组。在第九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以及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军的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设立党代表。各军、师设立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加强党对军队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指导。8月3日，起义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开始撤离南昌，但南下作战连遭不利，使起义军由南昌时的2.3万余人锐减至瑞金、会昌时的1万余人。10月中旬，起义军第二十五师等余部进至赣南安远天心圩时，全军只剩下1500余人。就在队伍处于进一步溃散的危急关

头，第九军军长朱德召集全体军人大会，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队伍由此得到初步稳定。10月底，起义军利用李宗仁集团和唐生智集团军阀混战的机会，在大庾（大余）再次进行整顿，将部队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重点整顿了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和团员，并将他们统一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时，起义军虽减至800余人，但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更加精干和坚强了。

八一南昌起义的全部史实表明：中共中央是南昌起义的批准者、组织者，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是南昌起义的现场指挥者，共产党人是南昌起义中冲锋陷阵的先锋战士，党的组织是南昌起义部队在转移过程中的中坚力量。没有党，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南昌起义，也就没有今天的人民军队。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端于南昌起义”，是具有不容置疑的史实依据的。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奠基于三湾改编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刚刚组建的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师所辖各团在向长沙推进时，先后在平江和浏阳遇挫。9月14日，毛泽东当机立断，原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停止执行，命令各部立即撤出战斗，转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并于9月19日作出决定，部队离开文家市，向湘南进军。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经过沿途的艰苦行军和激烈战斗，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部队已由原来的5000人减少至不足1000人。考虑到部队到达三湾后已远离中心城市，敌情压力减轻，更由于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如党的组织不健全、官兵关系紧张、士气低落等已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毛泽东便在三湾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

整顿的重点是切实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在部队各级普遍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并提出明确要求：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小组，营、团建立党委，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与此同时，决定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由党组织书记任同级党代表，负责党务工作、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党代表与军事长官共同管理和指挥部队。三湾改编的这些决定，不仅明确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架构、职权职责，而且明确了将其落到实处的领导格局、方法途径，树立了政治工作在部队的权威地位。这就使部队从此之后有了稳定的、坚强的战斗堡垒，使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成为普遍要求，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明显增强了。谈到三湾改编，罗荣桓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会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

造，还需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后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由南昌起义时的“支部建在团上”到三湾改编时的“支部建在连上”，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架构的下沉，而是对党的领导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加强。它更便于把党的意图、党的任务、党的要求迅速而准确地落实到部队的各个层级和基层单位，落实到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为军队能打胜仗创造了重要条件，提供了根本保证。在改编过程中，前委还允许不愿留下的官兵离队，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同时，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确立了官兵同为阶级兄弟的新型关系，有效地巩固了部队。三湾改编作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的重要奠基，将永载人民军队和党的建设发展的史册！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定型于古田会议

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为例，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部队、赣南和闽西入伍的农民、俘虏兵这三部分人大约各占总数的 20%，湘南农军、平浏农军约占 40%。这就是说，红军的基本成分是农民，“虽然红军广大官兵具有献身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但农民阶级的烙印和旧军队习气，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和军队的建设，但这种认识和做法在红军初创时期并未取得一致看法。在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后，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以致出现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非但没有被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多数人认识和接

受，反而造成他本人在前委书记的选举中落选。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9月来信），为这种局面的改变提供了重要条件。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召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并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由多个分决议组成。其中，《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是整个决议的核心，“它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八种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危害，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必须加强红军中的党组织建设；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强调红军必须建立很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其中，关于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决议指出，党在红军中的组织，担负着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红军必须实行党委制，“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红军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使党的组织确实成为“领导的中枢”，“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应当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等等。罗荣桓同志认为：“古田会议就是总结经验，把部队中存在的错误的东西，如：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括起来，做个总结，重申军队内的民主作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它解决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重大问题。这些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它不仅对于红四军的建设，而且对于红军其他部队的建设，不仅对于红军的建设，而且对于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正是从古田出发，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

从南昌起义到三湾改编再到古田会议，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像一条红线一样一直贯穿下来，其发展的轨迹显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主题没有变，内容在不断增加、范围在不断扩大、要求在不断提高、系统性在不断加强，清晰地显示出了发端——奠基——定型的过程，清晰地显示出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不断成熟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90年来，在长期实践中，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是人民军队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这就告诉我们：一整套建军治军的原则，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就是人民军队的传家法宝和红色血脉；而这一切之所以得以形成、发展和培育，就都是因为“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

进”。“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大前提、总前提；而这种大前提、总前提，正是一切旧军队所绝不可能具备的。因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组织和推进，开启了奋力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为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中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民军队对党的“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人民解放军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和战斗力的源泉，是我们这支威武之师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绝对保障。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必定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文发表于《党建研究》2017年第9期。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在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游击队 革命斗争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龙新民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中央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好今天的长征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中，今天，我们在革命老区富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游击队革命斗争史学术研讨会，纪念以云南省富宁县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建 82 周年，这对于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弘扬革命老区精神，深入推进党史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为打赢老区脱贫攻坚战凝聚智慧和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开创滇黔桂边区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重大贡献的云南各族干部群众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出席会议的各级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和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 82 年前滇黔桂边区那段光荣的革命历史，我们思绪万千，感慨良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通过艰辛探索，成功走出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创建了几十块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就是其中一块独立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后建立的红七军播下的革命火种；是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之后，中共右江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党委创建的以云南富宁为中心，以滇桂边、黔桂边和右江上、下游为重要活动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后，党领导红军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重要革命根据地；是西南地区创建时间最早、坚持斗争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少数民族最多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有坚强的党组织，有英勇善战的红军游击队，有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革命政权，有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的赤卫队，有竭尽全力支持革命的各族人民群众。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是红军指战员充满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热血谱写的一部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

82 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在那场艰苦卓绝斗争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和迸发出的强大力量，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芒。我们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征程中，纪念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建 82 周年，就是要以此为契机，总结历史经验，弘扬老区精神，紧密结合新的实际，更好地把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从党史工作的角度，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要加大对根据地历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力度。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辖区范围广、斗争时间长。从空间上看，活动范围达云南、贵州、广西3省（区）28个县；从时间上看，从1931年红军干部到富宁开展革命活动，到1937年红军游击队主力撤离根据地接受整编参加抗日，将近7年时间。这块根据地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是我们开展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多年来，党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付出艰苦努力，征集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特别是201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组织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党史部门，专门开展课题研究工作，收集、整理了一大批滇黔桂边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希望各地各部门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进一步加大对滇黔桂边区革命斗争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研究，认真总结研究根据地建设的历史贡献和基本经验，切实利用好课题研究成果，充分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应当成为推进这项研究深入开展的新起点，努力争取收获更多的研究成果。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学会将继续大力推动和支持这项工作。

第二，要继承弘扬老区的光荣传统和红军的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滇黔桂边区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统治、建立红色政权的伟大实践，丰富了我们党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思想；根据地军民

创造性地开展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民族工作、宣传文化工作以及经济工作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实践，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我们要继承弘扬老区的优良传统和红军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红军滇黔桂边游击队在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一定要传承好红色基因，讲好红军故事，讲好党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把老区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付诸实践，永远传承下去。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老区党史遗址的保护利用和资源开发。

分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革命老区的党史遗址、遗迹、革命纪念地，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重要见证，是党和人民伟大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根据近几年来党史部门的普查，全国共普查登记革命遗址近 5 万处，相关联的其他遗址 5000 余处。多年来，各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视对党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开发和利用，不仅摸清了各地革命遗址的基本状况，保护了一大批濒于损毁的革命遗址，而且在充分利用革命遗址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爱国